



如何“正确评估”雅万高铁?

■ 本报评论员:余凡

国内外瞩目的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雅万高铁/KCJB)虽然工期延长,但工程量已超过70%。因佐科维总统同意以国家预算(APBN)支持雅万高铁的建设资金,背离了前国企部长保证雅万高铁纯粹是商业合作(B to B),不动用国家资金的承诺,引发了议论。

近期,资深经济学者费沙尔表示,雅万高铁是由印中合资企业(KCIC)全权运营,印尼方面由4家相关的国企(BUMN)承担。考虑到雅万高铁的估计总投资增至114.24兆(triliun)印尼盾,担心会对国企造成投资的压力和亏损。“不久后,民众开始搭乘高铁,到时的单程票可能是40万盾。估计到世界末日都不能挣回本钱!”认为该工程是浪费国库的。

《点滴金融》(detikFinance)于12日报道,海洋及投资统筹部(Marinvest)投资及矿业厅副厅长施普迪安(Septian Hario Seto)解析,雅万高铁超过预算的工程款约16亿美元(约24兆印尼盾),是一些意外因素造成的。“很多国家的高铁工程也遭遇与我们相同的处境,预算膨胀很正常,工程进行时地质及地心引力问题是无法预测的。”“譬如计划在普哇卡达(Purwakarta)朝着万隆市方向建一个隧道,却遇到难以钻穿的岩石层,需要运用爆破等特殊措施,以至工程费用飙升。”此外,政府在处理民众的土地赔偿时遇到一些困难,而耽误了施工的时间。工程总计已拨出了15兆印尼盾的土地赔偿金。

《罗盘网》(KOMPAS.com)于16日报道,除了对工程资金超出预算的不

满,民众也认为雅加达至万隆仅150公里的距离并不远,雅万高铁其实并非迫切需要的工程,政府及国企更应该在原有的铁路基础设施上,提升雅加达至泗水市铁道客运的装备、服务和速度。

民间团体“印尼民众交通”(MTI)的发言人认为:“雅万高铁是不着边际(nanggung)的工程。为何这么说?因为其终点站竟设在城郊的Tegalluar区,而不是在万隆市。”“说来好笑,搭高铁快了半小时,但到Tegalluar,出了站还要堵车数小时才能到万隆市中心。”

而另一个设在巴达拉朗(Padalarang)的车站离开万隆市尚有24公里,从车站到市区同样要面对交通堵塞的困境。至于雅加达方面,雅万高铁总站设在雅加达东市的哈林(Halim)区,而该区连贯首都中心

区的各主要道路也是车水马龙、交通拥挤,非常不便。

况且,长久以来,雅加达及万隆两地民众已习惯搭乘“阿尔果火车”(Argo Parahyangan),而两地的火车站都设在市中心,交通比较便利,车票价格也比较便宜。加上雅加达至万隆距离并不远,沿途还要停靠几个车站,高铁肯定不能全速行驶,这会造成运营成本提高。此外,还要面对大型客车及私家车的竞争,雅万高铁的客源可能不会达到理想。

《时代网》(TEMPO.CO)近日称,针对费沙尔所说雅万高铁难以回本的言论,国企部(BUMN)专员阿利亚(Arya Sinulingga)澄清,雅万高铁的投资是长远计划,估计要运行40年后才能挣回,这在全球各国的高铁建设项目都是司空见惯的。“这是我们保守的估

计,还只是粗略的计算,就像是对地铁工程(MRT)的预估一样。”他补充说明,国企部门目前还在等待雅万高铁(KCJB)建设所面对的超额预算报告,并让“建设财务调查局”(BPKP)进行审计核算后,才能知道确实的数目。国企部将严格按照程序对每个投资项目进行监管。

费沙尔还阐述说,雅万高铁在早期工程草案的协调时,就有多位部长及专家表态反对。连政府以15万美金聘请独立的波士顿顾问公司(BCG),在进行2周的调研后,建议政府放弃高铁工程。但没说明最早的草案是由日本或中国专家提出的?也没提到为何请占全球高铁总里数仅1%,只有735公里高铁的,非其专长的美国公司来评估“高铁建设”?

著名政论员德尼(Denny Siregar)在其视频节目

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在经过深入了解及仔细探讨后,试以浅白的词语及道理与民众分享他对雅万高铁的看法。他不赞同费沙尔只以数字和资金为依据的狭隘眼界。并举例建一家工厂,不单是工厂的投资及盈利,还有繁衍而来的小铺商贩、交通运输、工作机会、民生地价等,都会水涨船高。总统及政府的着眼处肯定更高、更宽广,雅万可能是牛刀小试,日后还准备在各大岛自建高铁呢。

还记得2019年2月,当总统在全国大力兴建高速公路时,有政客指责应注重经济,“高速路不能当饭吃。”而如今,那些已通车的高速路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了省际的交通贸易。希望雅万高铁的建设也能以现代的分析,得到公正而前瞻的评估。

蔡英文抛出“新两国论”的野心

■ 香港:季霍刚

针对蔡英文在8月31日在“凯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致词时表示,“台湾不走向军事对抗,盼与邻国在和平、稳定、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当时国台办已响应强调民进党当局夹带“两国论”,是“肆意的挑衅,邪恶的行径,必将招致正义的行动”。虽然凯达格兰论坛会议一般认为是台湾找一些退将、退休官员自娱的节目,但起码有所避忌,未有直呼和指明是针对对岸。而国台办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采用了“两国论”一词响应,可见国台办已经洞见其意图和作出定性。

反观蔡英文在10月10日称“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场合同时是内宣和外宣的阵地,蔡英文直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并称“互不

隶属”,是对对岸具针对性的论述宣示。国台办当晚再严词重申两岸同属一中,并指民进党当局是渐进台独。蔡英文的“新两国论”由“邻国”渐进演化为“互不隶属”基本上一脉相承。“邻国”在英文原文是NEIGHBOR(邻居),论述模糊,本可澄清撤回,但蔡英文没有修正,可见民进党已经准备将“邻国论”公开化、扩大化、理论化、明确化。

媒体报导蔡英文在中秋节前已草拟部分初稿,还强调是蔡英文的心路历程,这种补足似在以时间推前淡化、模糊蔡英文讲话并非在回应中共习近平总书记的10月9日的讲话,但现时讲话既出,悔不当初无补于事。先是大陆禁止台湾部份水果入口,国台办大力反对台湾申请加入CPTPP,再而有解放军机10月初频频围绕台岛。随后习近平发表对台讲话,蔡英文选择

将“邻国论”的升级发表的场合和时间都令人极为不安。蔡英文既称是自己执笔,但眼见两岸碰撞在即仍无意权事制宜,并无大幅修改讲稿,化危为机,反而一意孤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9日强调“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明显是意有所指、有的放矢。“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即便是贩夫走卒、寻常人家皆可违背良心地作,但上升至“分裂国家”则只有有权力、具话语权、操控政治的人才具“分裂国家”之力。

这段讲辞具有层次感,蔡英文听而不闻,继续铤而走险。到底是基于“九合一选举”临近,还是意图转移民众视线,施诡诈之计图令众议纷纭,令民众沉溺两岸对峙题材,而暂时分散民众对民进党支持度暴挫之注意,蔡英文的动机值得两岸学者、民众深思。蔡英文甚至可能是因为李登辉既曾

提出“两国论”,陈水扁亦有“一边一国论”,蔡英文可能认为自己平平无奇的论述,难以在“台独”界别永久立足,故在此时抛出这种惊人言论。

正被罢免的立委陈柏惟称“让中共不开心才被罢免”,而民进党不惧自招民怨怒恨,反而孤注一掷陈柏惟,可见民进党和陈柏惟路线一致——对自己在岛内施政纰漏仍假借“两岸牌”、“中共牌”来打救,其手段拙劣,而效果则极为有限。“新两国论”只是为李登辉“台独”思想苟延残喘,同时企图以此分散分化民意,笔者相信中国大陆已透彻地灼见其中手法,是否会加深两岸隙缝,这是肯定。是否能拯济蔡英文滑落中的民望,以现时情势而观,岛上内外交困,只恐民望回魂乏术。

(作者系香港时评员、上海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传承 再回首

■ 台湾:千翔

■ 台湾:林锦绣

秋告诉风,天凉了
冷气不要开那么强了
叶子们都失去水分,枯了

时间这个老雕刻师不耐心
他总是在这个时节容易失手几回
送走一些失败的作品进入火场
他想取暖,因为
冬天是个爱哭闹的孩子;更怕冷

他习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一条
隐形的轨道上,身后
远远地跟着四个孩子,也孤独地走着
日日夜夜
他知道:
有一天他会躺下/睡着
有一天会有新的孩子/加入/补替,更
有一天,会有个孩子接替他孤独的
一直走/走到新的轨道上

脸上挂上久违青春招牌
我的青涩岁月又呈现舞台

进入时光隧道
白色梦幻迎面冲来
跃上席梦思床
允许再编梦想

挑掉纵横交错的网络
寻找回春特快列车
青春足迹四方到处乱窜
找不到车站停靠

驮着老化的贝壳
丑陋的外表抗议声隆隆
外貌协会拒绝收容
自信大声讪笑

掉回时光走廊
草原上蝶舞飞扬
我的青涩稚气贴在脸庞
逐蝶始终奔忙

打开清晰的现实画面
知足爬上我的脸颊



林庆铺文学作品片段

荷兰统治下的华人群体

印尼公民联盟出版的《1946-1956 望加锡华人联盟十年风雨》一书中提到,大部分华人就职于望加锡的进出口贸易、银行业、航运业及其他行业。交易商品一般为椰干和其他农产品。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其他殖民地,如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一样,殖民者根据文化水平,将望加锡华人分为3个群体,即荷兰语华人、华语华人群体和马来语华人群体。尽管如此,由于望加锡及其附近地区方言更为盛行,当地华人群体大部分以布吉斯-望加锡语为口语,以隆塔拉文字为书面语。因此,许多中国名著和民间故事都被翻译为布吉斯-望加锡语,并以隆塔拉文字记载下来。

举个例子,林庆铺

洪万昌与何英如——如醉似痴的爱情诗歌(2)

欧阳春梅(Myra Sidharta)

(Liem Kheng Yong) (1875-1933)曾翻译了60余册书籍,这些书籍全部用手誊写,随后租借给读者赚取些许租金。除了翻译作品外,林庆铺还写了一首长达114行的诗歌,表达对现代价值观衰落的担忧,尤其是对那些追求时尚,喜欢展示身段,与男性手挽手逛街的女性。

《1946-1956 望加锡华人民十年风雨》一书中,杨高教(Yo Kao Tjiao)提到,林庆铺没有继承其父的商店,但他以租书养活一家人。1982年,林庆铺的书籍仍保存在他位于望加锡马来由村的家中。努山达拉手稿协会致力于旧手稿研究。2001年,在努山达拉手稿协会(Manassa)的资助下,布吉斯文学家赛弗汀·巴鲁姆(Shaifudin Bahrum)将林庆铺翻译的一则故事翻译为印尼语。

除林庆铺外还有一些名气较小的译者,如林成贤(Liem Cheng Heang)和蔡炎辉(Tjoa Yam Hoei)(Hamonid dan Salmon,1983:143-177)。

1932年,剧作家杨众生携剧团到望加锡考察访问,

遇到了一个热衷文学和戏剧的土生华人群体。除了安排剧团演出以外,杨众生还与记者和作家等知识分子会面。当时,市面上有一些马来语的报刊杂志,比如《新华报》和《望加锡日报》。从这些报刊杂志中,杨众生了解了望加锡人的生活面貌并以此作为素材创作小说。杨众生的小说大多讲述爱情和悲剧,尤其是那些由于女方父母嫌贫爱富,一心寻找金龟婿,而备遭磨难的爱情。1929年社会经济大萧条时期,父母们,尤其是那些家有美丽女儿的父母,在女儿的追求者中千挑万选,试图寻找更富有的婆家。另一个杨众生喜欢叙述的悲剧主题是发生在恋人间的悲剧,例如浓情蜜意之时,其中一人却骤然离世。

杨众生拜访了许多致力于将中文小说翻译成马来语的华人,马松林(Ma Siong Lin)就是其中之一。马松林不仅翻译中国古诗,还定期将自己创作的诗歌投稿给杂志社和其他媒体。除了杨众生提及的几位男性作家,许多女性也积极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或撰写文章,张源

娘(Thio Sumber Nio)就是其中之一。1927至1929年间,张源娘创作了多部小说并在《全景》杂志刊出。1928年,华人女性记者协会成立,张源娘成为其中一员。

上世纪40年代末,《五彩》杂志曾刊登了许多由苏莲芝(Soh Lian Tjie)(详细信息见第二部分《望加锡华人活动家与记者——苏莲芝》)所写的关于望加锡地区华人文化的文章。苏莲芝就职于新闻部,在广播界颇为活跃。上世纪90年代,她已是80岁的耄耋老人,她写了一本回忆录,可惜并未出版。现今,接受荷兰教育的女性作家卡拉·毕安本(Carla Bianpoen)时常在英文报纸中刊登有关艺术的文章。

望加锡文学

罗格·托尔(Roger Tol)说道,与爪哇文学和峇厘文学的研究十分落后。托尔用望加锡语写了一篇关于史诗的博士论文,题为《(阿龙·拉布阿亚史诗)》。托尔认为,大部分有关布吉斯文学的文章都出自一个世纪前的班杰明·弗雷德里克·马瑟斯(B.F. Matthes)之手。时至今日,

研究望加锡文学的文章与日俱增,但与爪哇文学研究文章相比,仍是九牛一毛。

华人马来语文学研究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自上世纪60年代起,克劳婷·苏尔梦(注院按第一册统一译法)(Claudine Salmon)与丈夫丹尼斯·隆巴(Denys Lombard)对华人马来语文学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文章发表在杂志《群岛》(法国境内发行的杂志)上。1981年,苏尔梦出版了一份目录,刊载了所有华人马来文学作品的题目。廖建裕也曾对武侠小说和报纸等华人马来语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并发表文章。而笔者则对华人马来语小说家的生平进行研究并撰写文章。

1992年,印尼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会上宣读了几篇关于华人马来语文学的研究论文,其中包括旧文稿研究专家亨利·查伯特·罗所写关于旧诗的论文。1996年,格拉新多(Grasindo)出版社致力于重新出版过去的华人马来语小说作品。当时,廖建裕已挑选好了需要出版的作品,然而不知何故,出版计划没能继续进行下去。最终,只由廖建裕主编的《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和其他作者的作品替代出版。

1998年,流行文学出版社格拉美迪亚(Gramedia)再次引燃华人马来语文学热潮。2000年2月,第一册旧文学作品选集《华人马来语

文学与印尼民族》出版后很快就已售罄,因而,其他选集紧随着一册接一册地出版。令人可惜的是,自2007年第10册出版后就停止了。

荷兰莱顿大学马来语文学教授汉克·梅尔(Henk Marier)在荷兰大力推广华人马来语文学。2002年,汉克教授出版《稍纵即逝的幸福》,其中收录了杨众生的两部作品,并亲自撰写了前言和后记。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的题材皆关于异族通婚。《拉登·阿珍·慕尔夏》讲述了荷兰小伙儿和爪哇姑娘的婚姻故事,而《荷兰姑娘成为华人之妻》讲述了华人青年和荷兰姑娘的婚姻故事。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缇内琦·海尔威格(Tineke Hellwig)教授也写了一些关于华人马来语文学作品的文章。此外,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篇相关的德语文章。不仅如此,还曾有一个巴西人给我发来邮件,希望能将一部华人马来语文学作品翻译成葡萄牙语。

与华人马来语文学作品的研究相比,关于望加锡-布吉斯方言文学作品的研究仅有两篇。一篇是刊载于克劳婷·苏尔梦与吉尔伯·哈莫尼克(Gilbert Hamonic)所著的《望加锡华人社会研究》作品中的一个文学章节,另一篇则是罗格·托尔所写的关于洪万昌的文章。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